

“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与时空想象

徐德明 李 真

扬州评话中饮食在全面表现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这和前现代扬州人日常无所事事的生活消费背景相关联。扬州评话叙述饮食的重心在人物动作及人物相互间的关系,饮食行为的背后有一种生活的时/空秩序,这个秩序隐含着酒色财气的描述性价值标准。拈出“王派水浒”中的饮食文学/文化来研究,不只是将其作为文学表现的一种对象,更为看重的是中国人在前现代社会文化中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在扬州评话中表现得最充分。

“王派水浒”^①是扬州评话的代表,王少堂饮食想象的叙/演述^②是典型范式。扬州评话叙事的总体美学原则是全面、细腻地表现日常生活^③,故而饮食叙述是其本色当行:饮食即生活。

一、“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

“食色性也”渗透于扬州评话,可谓饮食即生活,这也是“王派水浒”的主要内容与精神要义。精通北方评书的老舍^④评述《武松》,论其全面细腻的叙述:“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知,说得头头是道……从四面八方描写生活,一丝不苟,丝丝入扣。”“巨细不遗,搏兔亦用全力。”^⑤惟其扬州评话的全面细腻的日常生活美学,饮食叙述自然也有全面、细腻的美学特点,“王派水浒”更有其独特的饮食场合的时空转换与人际关系处理。王少堂叙述饮食酒肉,目的不在饮食对象自身,而在于饮食活动过程人的生活价值的体现。《武松》、《宋江》等书中不厌其烦的饮食叙述,因其过程和人物关系的多样,决不重复而富有魅力。

王少堂演说四部大书,频繁地叙/演述人物的饮食活动。他并不引导听众耽溺齿颊口腹,也不让思想重新消化饮食。他的饮食叙述的美学趣味不偏向于享受,不为告诉听众/读者,人物吃些山珍海味、琼浆酯酒、时鲜果蔬,却是将饮食活动作为一种想象方式,作为人物安身立命的时空变化的标记。这是独特的饮食叙事的美学,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人生命/生活要素的

理解,它所涉及到的物质生活方式与人们对待这种方式的态度,正是理解前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切实有效途径。

“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可以直接上溯的源头是施耐庵(背后有司马迁以降的整个中国文史传统),他们有一脉相承的饮食想象方式,更有一致的“酒账肉簿”的叙述,更兼其间有批评家金圣叹等,不断地以“评点”提醒人们对这种想象的关注^⑥。“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中活跃着的市井百姓的生命文化,形成有别于士大夫精英文化的小传统,只因对这个传统的习焉不察,我们至今仍然缺少对其饮食美学的阐发。为此,笔者这样阐述“王派水浒”的饮食美学:通过饮食活动的全面细腻的文字表述,剖明前现代中国市民生活的文化肌质与特征,扯动小说叙事中的饮食生活链条,看“民以食为天”的文化是如何具象化到生活程序中,其精神与物理的双重空间秩序遵循着“酒色财气”的描述性价值标准。文章第一步要阐述的是其全面细腻的特征。

全面来自于经验的丰富。也许是夸口,但至少要有贪图口福的愿望、经验、品位与习惯,扬州人自称“吃在扬州”!且不论在地本位的偏颇,起码扬州人对饮食文化有自信,能够在物质的、想象的层面证实它。扬州本来是一个富有精湛烹调艺术的城市,精妙的饮馔给人们带来的口腹享受本应该充分反映在评话的叙述过程中,王少堂把饮食叙述的功用限定于事件与冲突发展的前奏及伴生状态,通过这种状态昭示事情发生在扬州文化语境中。《武松》说山东、河南一带的事情,却分明是扬州的文化背景,王少堂辈的说书人的文化认同不得不服从于书场中的听众。《武松》本要叙述力拔山、气盖世的打虎英雄故事,且要“打尽天下不明道德之人”,他是自然与传统道德两个面向上的双料英雄。但除了气力惊人与打虎的有限叙述,全书不太强调武松作为英雄的超越性,他的壮举大都建立在平凡的世俗基础上,其行动经历的场面始终不离日常饮食活动,打虎、惩奸之外的“壮举”是比一般人口胃健旺,“平生好酒”,海饮豪吃,“牛肉动把抓、鸡蛋甩流星”。王少堂在扬州人的饮食经验中说一个“异己”的英雄“吃相”,武松有一般扬州人所说的“脍”相。这样的说法的好处是赢得一种“熟悉的陌生”的审美效果,听/观众(包括看记录整理文本的读者)对武松所处的扬州文化生活语境一目了然,英雄人物是被“嵌入”这个语境的,饮食叙述能够使英雄人物与在地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其个性化的行动方式又把他和背景区别开来。听众对英雄只是远远地敬礼,对身边熟悉的饮食文化,如酒店的跑堂、小二等,却可以欣赏褒玩。说书人可以将英雄纳入某个行为秩序,更可以充分裕如地展示自己的经验与饮食文化修养,表达那个“熟悉的陌生”。

既有英雄,又有市井,老舍判定《武松》为“通俗史诗”^⑦。“史诗”、“通俗”这两个词应该分割来看,武松一直是民间故事和评话、评书中传说的英雄,具有“精拳捕虎”——赤手空拳征服自然——的超越品质,说“通俗”则是因其日常生活的构成与普通市民一致,如饮食、衣着和礼节与一般社会和光同尘。英雄也要吃饭,《武松》的饮食叙事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王派水浒”的几部书目整体如此,李逵、鲁智深、石秀等等,没有不与酒肉饮食叙事关联紧密的。从宋代已经开始了白话小说中以饮食为叙述重心的传统,王少堂饮食叙述的大关节目基本不悖施耐庵《水浒传》模样,《西游记》取经的目标还不如每到一地的托钵化缘的过程突出,《红楼梦》的家族宴饮与诗酒雅聚是叙述进展的标志,而晚清狭邪小说完全离不开“摆台”^⑧的饮食程序。

为什么饮食活动在中国文学叙述中占据要津?从远处说,中国小说的艺术构成与汉民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生活在传统世界里的中国百姓没有基督教文化中人与神的精神联系,看重的是亲朋伦理关系,中国文学叙述成功的是人际交往。若论种种人际关系展示的场面,最方便不过共同的饮食活动。这样的处置方式,始于非虚构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叙事的客观化的限

制下,司马迁仍将一些重大事件的展开依托于饮食叙述。《史记》中人际冲突、性命攸关的场景莫过于“鸿门宴”,那一场依托于饮食活动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一直是后世中国叙事文学的典范。宋代开始的白话小说基本上以说闲事为主,讲史少不了醇酒妇人,朴刀杆棒、烟粉灵怪更离不开日常市井琐屑生活,其基础平台是一日三餐,用些“酒食”才便于在场面上体现人的相互关系的发展,给予事件的谋划、规定与转折以机会。宋代以后说话人/小说家和明清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们努力自重,常常将小说比并《史》、《汉》,小说中用大量篇幅致力饮食活动的叙述已经自成传统。

就近而言,扬州评话在近现代处于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王派水浒”四部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陆续记录整理的文本达三百多万字)都着力日常生活的叙述,举凡日常饮饌起居等,形形色色,无不具备。王少堂通过日常琐屑生活的细腻说表,将《水浒》中与武松相关的不足十回的数万字发展成《武松》的八十多万字^⑨。《武松》十回书共六十一节,各回分节不等,每回必有多番饮食叙事,有时一节之中有多处饮食场景。王少堂较施耐庵九倍以上文字篇幅的敷演,就是靠想象力与日常生活经验的结合,饮食活动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想象资源。在一日三餐,早茶、中饭、晚酒的固定生活程序中,千变万化的人际关系建构一个个具体场合:独酌、对饮、小聚、一般席面、大宴宾朋……大体的饮食活动如节庆家宴、路途打尖、接风、留客、叙别、送行、婚娶、结拜、调情、庆贺、议事、设局、调查、守夜,名目反常的则有坐待谋杀成功的“人头酒”、施与斩犯恩典的“断头酒”、杀嫂祭兄的“邻证酒”、佯醉寻仇的“斗打酒”,黑店中“蒙汗药酒”等等。其他《宋江》、《石秀》、《卢俊义》三部书中也不胜枚举,仅《卢俊义》中的《计请神医》一节,就有四次不同人物的饮酒场面。

通常评话艺术家的价值取舍较为模糊而接近普通市民,书词中很少表现对官方和精英文化的认同,却有意呈现富有地方特色的物质文化生活,饮食自然又是主角。说书人故意地把“聚义”处理成为“聚饮”,在“造反”与“招安”之间谋求价值中立。说书叙述结盟弟兄的分手、聚会都以酒食为媒,他们叙述剪径杀人与庇护罪犯一般地用酒,甚至把通奸处理成共食,让勾串谋奸与谋划捉奸一例地吃吃喝喝,让仇杀与复仇都与饮饌连扯,请人出力与代人栽赃都得以酒食诉求,让被处决的人犯命悬一线和享用最后一块肉、一杯酒的生命相辩证。饮食之用,在扬州评话(尤其是“王派水浒”的《武松》)中登峰造极,这些饮食想象将日常琐屑的生活细节与重大的冲突有机组织,使得话本结构“肌理细腻骨肉匀”,并不在乎价值立场是否暧昧或是丧失。

扬州民风有闲,好吃而不贪,饮食已经成了生活艺术中必不可少的方式。平心而论,如果让生活返归最简单的状态,饮食必然居第一重要位置,如果让长江下游苏中、苏北平原上人们的生活返归工业文明之前,其状况必然如扬州评话所现,无所事事,不追求什么,却是自在休闲。扬州评话书台上叙述的生活与书场中听众的生活基本毫无二致,关注一天三顿的饮食,如何吃,与谁在一起吃,吃的背后是怎样的生活态度,饮食世界与人生哲理的把握自然地融为一体。人类社会势必不能回归前工业文明,现代性目的指归的生活内涵没有给传统饮食文化留下多大意义空间。但复现扬州评话中的饮食美学与想象方式,或许可以祛除一点现代性的迷魅,提醒现代人生活原来有过别样休闲的可能。

“王派水浒”是典型的“闲书”,这不是精英读书人摆出评议、欣赏的姿态来“闲话”市井面目,却是在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中闲闲道来,呈现一种人生活法,更难能的是将传说中的英雄故事嵌入这个语境。说书人要说“常人”的一日三餐,也要说“异人”(英雄人物)既不免俗又能脱俗的性情。武松的喝酒、李逵的吃鱼(《宋江》),既类似一般市民的“好吃”,吃的方式却又是

英雄本色。“王派水浒”话本源头是宋代的故事,叙述的人物生活特点既不是宋徽宗时代,也不是施耐庵时代的生活,甚至不是柳敬亭口头的武松^⑩,那是晚清、民国时扬州的在地生活。运河交通的时代已是强弩之末,海上都市已然兴起,扬州城从经济中心地位滑向了边缘,“傻儿游沪”的文学想象正是说明。但是,绝大多数的扬州人对此并不自觉、敏感^⑪。静享闲逸的扬州“细民”仍然“暗昧”^⑫,他们根本不理论现代民族国家,依旧酣沉耽溺于评话的艺术闲话互动。扬州城进入民国后的几十年中也没有兴起大规模现代工商业,其生活闲在却一如既往,一日三餐,余暇便在茶馆、书场、澡堂里度过。书场中的艺术想象也仍然越不出日常生活,有那么一天闲暇扬州被现代化结束,悠闲的、“好吃”的饮食文化也就终结了,而“王派水浒”和整个扬州评话的发展巅峰到20世纪中叶便戛然而止了。

二、“王派水浒”时间想象:以“食”为“天”

在全面细腻的美学原则前提下,笔者专门讨论“王派水浒”饮食想象与时间/空间的关系。前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市井百姓的时间把握方式,他们的精神空间的秩序如何,我们至今没有深入讨论。通过怎样的对象进入这个论题?似乎没有怎么关心过。我们总是误认为,将古代精英知识阶层的思想文化搞清楚便了解了古代中国,其实忽略了市井的很大一部分。我以为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精英们的“书院文化”,另一个便是市井的“书台文化”。当中国出现“书院”精英文化群体的时候,另一个群体已经在市井“勾栏”中围绕着书台成型,他们形成了一个“大人群”的“小”传统。然而说书小道从来得不到精英们的青睐,自然没有几个人深入这个民间论域。书台文化最大的劣势在于不如书院文化的书面传播,说书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若非现代的录音整理记录,我们今天对王少堂的说书内容只好由其传人而知晓。对柳敬亭晚明说书的内容,我们没有很完整的概念(当然黄宗羲、吴伟业、张岱等人的传记,一些诗词的记载,为我们保留了一些珍贵资料),更何况一般的说书。要说原汁原味地保留民间生活,保留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市井中人们的包括饮食文化的生活方式,我至今没有看到比“王派水浒”为代表的扬州评话更成熟细致的语言叙述。我希冀在对“王派水浒”具体对象的探讨基础上,有一点形而上的理论建构。

文学的时间想象与科学的时间想象有别。时间的科学想象是格物致知的自然模型:太阳在天空中运行,日出日落而由东到西,中国人因始终看见太阳而“天”、“日”不分地命名白昼,不见天日就是“夜”,合而为一,便是“昼夜”整天。可是这一整天,当它被各种各样的琐细生活节目充斥的时候,文学叙述反映的感性生活中的时间想象便和格物致知有了区别。评话鼎盛前期^⑬的中国人生活相对单调,不像现代人以繁复事务日程来切分一天的时间,也不用现代机械的钟表指示时间,人们在不同季节、忙闲不一状态中都是根据身体反应来表示时间,饥饿与进食便成为一天中均衡的生活节奏。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息之间为提供体力、能量补充饮食,农闲一日三餐乃至两餐,大忙时节多至一日五餐。进入传统城市生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早已凝定了饮食起居与时间的关联。“一日三餐”不仅规定了农业社会中人们进食的顿次,更成为一个时间标志。

有充分理由说,民间百姓的时间想象是以“食(饮食)”为“天(时间)”。早中晚餐及其前后,都成了我们标志时间的固定单位。饮食时间的词组多是偏正结构,时间限制为偏,饮食为正,诸如“早茶”、“中饭”、“晚宴”等等。贴近于日常生活的评话系统,包括由此系统中转入书面叙述的市井小说,无不利用这个时间标志,子丑寅卯的计时方法反而不为一般人所习惯。于是,

人物的行动、事件进展的期限(灭此朝食)、时间跨度的长短(一顿饭的工夫),都可以用饮食来标志。扬州评话,以“王派水浒”为代表,把宋代勾栏中演说的市井生活表达得更为细腻,因而这以食为天的时间想象方式便成为中国口头/书面文学中最突出的表现。

“王派水浒”叙述饮食并非为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饮食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饮食已经成了连结生命时间单位的链条。极言之,饮食生活习惯也规制了人的生活,人活着不是为了饮食,饮食却成了活着的人的生命框架。每日固定时辰里必需的饮食,约定俗成的一年三节、时令节气、居家外出、人际交往,似乎都被镶嵌在固定的饮食格局中。从王少堂的叙述可知,饮食在扬州评话中有空前绝后的地位,他把一日三餐的习俗变为度量人物行动的空间与时间标志,这是任何一种以语言文字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从未达到过的。从施耐庵到王少堂,叙事的饮食时空的把握趋于极致,成为结构、叙述生活的态度与重要手段。抽绎其中的“饮食时间”、“饮食空间”分析,或许可以期望对中国本土的叙述学有所贡献。

“王派水浒”人物经历的是饮食时间,和“吃”联系着的动作过程与地点转移是叙述的基本程序。饮食时间,简而言之就是一天三顿,依照一定时刻进早中晚餐。《武松》开头讲英雄行走在往阳谷县寻兄的路上,看看“太阳大偏西”,武松的生理反应表明快要到晚饭时辰了,“腹中饥馁,意欲打尖”,于是进入景阳镇吃酒,因“三碗不过冈”与店家争执,乘醉直上景阳冈,卧倒在大青石上被老虎惊醒,演出惊天动地的打虎。喝酒几乎是武松的代名词,从施耐庵的《水浒传》开始,十回书中,武松每回都在吃酒。“醉打蒋门神”一段,武松从施恩处出发就喝酒,一路喝酒佯醉诈狂,饮食是贯穿事件发展的线索。武松被诬进都监府,八月十五与张都监全家晚宴,饮酒赏月,醉后三更半夜被栽赃冤盗。武松与饮食的关联集中在一个“酒”字上。

全部武松的人格呈现过程,无一处不是与饮食活动相关。王少堂根据情节需要,偶或故意改变武松喝酒的饮食习惯。扬州人习惯“吃早茶”,品尝茶点时商谈事情或者纯粹闲聊,饮茶、早点与茶馆的时间/场合关系更是中国的普遍生活方式^①。武松二度发配恩州,天不亮官差发落,余下的事情都是在饮食场合演述。其一,起解前武松要与盟弟施恩见面,预先交代杀回孟州城报“栽赃冤盗”之仇的打算,并嘱施恩回避可能的不利局面,他在衙门外“和事居”茶馆吃茶坐待拜弟;其二,蒋忠要谋武松性命,派人约请解押武松充军的长解差人吃早茶、喝酒行贿、雇佣杀人,“玉佩楼”茶馆是反派人物饮食的另一个场合;其三,长解受贿领命回到“和事居”,爆发出武松与两个长解之间“等待/不让等待”的冲突,武松泄愤而一气吃了五十四个包子让长解付账,双方增加恨意,起了杀心,武松不得已而上路;其四,施恩追到城郊松林,终于相会,摆下酒菜饯别,是又一场饮食。三方人物的多头绪的事情都在同一早晨发生,用“早晨”的抽象时间表述无法包含如此复杂的人事,“早茶”涵盖的饮食活动既规定了时间又提供了场所,更平添出人物冲突。饮食时间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它包含着日常的生活规则,寓有特定时间段内的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利益冲突与身份转移,提供多样情节发展可能供人们想象。抓住饮食时间来展开想象,正是“王派水浒”的基本结构法则。

王少堂擅长展开饮食时间的想象,更能够叙述人物主体对饮食时间的读解与应变行为,这是“王派水浒”独特的心理表现与艺术创造,它丰富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心理表现方式。饮食时间根据规律性的生理需求而定,但是当人物的心理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饮食时间便不能不随之而改变。西门庆对潘金莲的“急色”促生了心理紊乱,其饮食时间须重新安排,这就上演了他与书童西门兴“寝食不安”的喜剧。西门庆为第二日到王婆茶坊会潘金莲,从前一日晚饭后就盼望第二日天亮。从今天到明天,时间是两天,如果照王婆安排能够成功,就是自家生活的两重天,憧憬与焦虑折磨着西门庆的心,其欲火焚心、坐立不安的急色神态,借诸饮食行为

来叙述,是一幕趣味横生的戏剧。

王少堂对西门庆的时间感受的叙述有一个发展标志:从对“公共时间”的拒绝到“饮食时间”的自主。直到20世纪40年代,扬州城的夜晚和许许多多的旧城市一样,有人巡夜打更。定更到五更是全城人的公共时间秩序,打乱这个秩序的人不疯也颠。此情此境,西门庆忍受不了相对时间的缓慢,他要提速、要缩短更次之间的间隔,主观地把定更当作四更。所以,一夜之间主仆“问更”/“报更”、癫狂之心/常人之心的戏剧化展示,让人忍俊不禁。这才是王少堂绝妙叙述的开端,其“饮食时间”的舛错更是一出滑稽戏。

因为难挨时光,西门庆自欺欺人地误读饮食时间,使得饮食的顿次与节奏颠倒错乱,目的只是为自己早早出门赴茶坊之约。这种误读收到的效果,是变难以言表的情绪为一系列的饮食活动镜头。西门庆无法入眠,天刚亮就急忙将厨子叫起来,做一碗鸡汤面吃,吃了两根面条就饱了。刚刚放下早饭碗,他又要开上顿饭,这时别人家早饭还没有吃呢。六件头的饭菜端上来,他却几乎没有吃。在将早饭后当成午饭的敷衍之后,他就起身出门赴茶坊会潘金莲。西门庆的内心活动通过饮食时间的舛讹而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水浒传》中仅一句“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的一个“巴”字,被王少堂敷衍成一大篇极富戏剧性的文章。“王派水浒”创造了一条中国民间借助于饮食的心理表现公式:心理感受的失衡——饮食时间的舛讹——饮食行为的乖谬,这种加入了饮食时间中介的叙述,把不可见的心理转换成外显的动作行为,把难以言表的人心画出来,如在目前。这正是对中国文学叙述不如西方小说擅长心理表现的另样取径。

时光难挨的叙述,每每是爱情主题下的必然产物。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爱情虽有些畸形,但仍是一种情爱。对西门庆以饮食时间为中介的叙述之妙,可由与《西厢记》比较而彰著。得到莺莺“待月西厢下”的书柬,张君瑞便有了难以打发的时间漫长感,没有“饮食时间”相助,《西厢记》只能一味地强调人的主观情绪。张君瑞一人晌午叹天:“欲赴海棠花下约,太阳何苦又生根”;太阳偏西前,怨恨太阳:“今日万般的难得下去也!呵,碧空万里无云,空劳倦客身心,恨杀太阳贪战,不叫红日西沉。”日落在即,也等不得,无计可施:“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轮落。”张君瑞一人在台上怨天恨地,这种叫苦连天的戏,比之于《武松》中西门庆的喜剧与滑稽,少了好多的趣味。张君瑞式的感叹在中国文学的感伤与抒情传统中屡见不鲜,而《武松》中的西门庆会见潘金莲的前夕,无论是主仆夜话,还是饮食时间的颠倒错乱,都为原本《水浒传》不及,也是《金瓶梅》所难能。这种基于民间智慧的饮食时间的安排结构与表演,才是中国叙事诗学的精髓一种。“王派水浒”以“食”为“天”,用饮食时间将“食色性也”演绎到绝佳处。

饮食时间当然不全是王少堂的发明,它是历代评话艺术家智慧累积的明证。《水浒传》原本“血溅鸳鸯楼”的叙述就完全以饮食时间为依凭。先是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三人吃了一日的酒,等候谋害武松性命的回信。武松杀回孟州城都监府时,他们仍然在鸳鸯楼上吃酒。待斗杀三人,割下人头来,“见桌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钟子,一饮而尽,连吃了三四钟”,处处不离饮食。发展到“王派水浒”《武松》,连看城门的军士,马棚里上宿的人,都在饮酒,简直是无饮食不成文章。武松一路杀上楼去,经历的都是饮食时间。施耐庵以前的评话艺人如何利用饮食已经不可考,到施耐庵时代定型时的《水浒传》应该有饮食时间的自觉,否则不可能无时不说饮食。

对饮食时间的自觉,从叙述主体对叙述过程的控制看得更为明白。就利用饮食时间对叙述进程加以控制而言,从《水浒传》到《武松》是一脉相承。《水浒传》中“王婆贪贿说风情”和《武松》中的“王婆谋奸”基本一致,都在申说男女风情成功的两大关键,先是要有“五件事……潘、驴、邓、小、闲”的资本,然后是“挨十分光”的时间过程。前五分光要挨过通常的自然时间,第五

分光之后,就都与饮食时间相关。从第六到第九分光是男女内心情欲急速升腾的过程,但叙述仍得一分分光地挨。要把王婆与西门庆预谋的情欲进展的可行性变成现实。此时男女对抽象时间都失去了感受力,只有情欲主导方西门庆把握“挨光”的饮食时间过程。所谓“十分光”,关键只在后五分。第六分光才提到要“替老身与娘子浇手”吃酒,此后便都在饮食时间之内。前五分光,出场主导者是王婆,她所主导的过程只是一般的自然时间,而后五分光情理纠葛、心理复杂难以言明又要避免抽象的过程,就要借用“饮食时间”了。实际上,“十分光”中的饮食安排并不是客观的事态呈现,而是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戏剧化表现。叙述主体通过饮食时间来控制叙述过程,是因为它有一重特殊功能,可以将极难划为阶段把握的事情有次第地叙述出来,可以有效控制叙事的分寸和节奏。

三、“王派水浒”的空间想象:“酒、色、财、气”秩序

扬州评话艺人的活动空间都不太大,从明末清初往后,直到民国,没有谁如柳敬亭那样风云际会,谁也没有上江下江、江南江北奔走四方的生活经验。所以,扬州评话艺人根据自身经验形塑话本文化生活空间的能力比较有限。尽管“王派水浒”演述的武松、宋江等的活动涉及山东与河南、河北,其实王氏几代人上台说“水浒”之前,根本没有亲历过这些地方的风土文化^⑮,他们说的仍只是扬州的文化空间。他们在话本中建构文化生活空间,仍然得依赖于《水浒传》原著中的思想维度,依赖明代以后话本小说中的民间意识形态(几乎是精英的边缘知识分子的通识),这便是“酒、色、财、气”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看起来只有酒和饮食直接联系,其实另外三者也息息相关。其中,“酒”是直接地频繁出现的饮食物质,“色”与酒好似骨肉相连(“酒徒”是刘伶这样的文人的专利,“酒色之徒”则全部是贪于口腹声色欲望者的共名),“财”通常是前二者的支撑力量,“气”是精神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成为人物牵涉到前三者行为的原动力。这四者连成一气,既成为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民间伦理的描述方式,又常常成为一种人际交往的空间想象秩序。这个秩序往往以饮食活动为枢纽而得以展现,所以“王派水浒”中的饮食空间与“酒、色、财、气”的市民伦理秩序合二而一。所以,笔者命名“饮食空间”的重心不在饮食酒肴而在文化生活空间,从中可以窥见扬州古城的市井百姓的精神。

中国的空间文化历来有伦理秩序的意味,诸凡地理的中原、边鄙,建筑的故宫、孔府、古城乃至徽州民居的布局都是如此,饮食空间中的伦理文化当然不可能像建筑那样明确。中国人在酒席上通常由座次的空间安排来讲究长幼尊卑的礼数,东方人的饮食行为也不像西方的宴饮文化历史,不如希腊人那样一味讲究热情好客,或宾客滥用权利,更不如柏拉图《会饮》讨论哲学命题^⑯。扬州评话中的饮食想象的空间是演述者人为建构的,其想象维度依靠敷衍明代小说中的民间伦理思想,通过事实来折中演述,体现着一种描述性价值标准。这种建构与演述形成不无混沌的秩序,影响着“王派水浒”中的人物行动,书中主人公与其他人等的饮食空间与行为都按照这个维度来演述。王少堂说《武松》,开宗明义:“过去的人,酒、色、财、气这四个字难免,惟有武松只好两个字,好贪杯,好动不平气,财色二字无他之分”。金圣叹《水浒》评点内容也以这四重要素为着眼点,散见于各种批语里。景阳镇、五台山下都是论酒的重点,武松的一生就是好酒、远色、不爱财、任侠使气。“酒、色、财、气”在中国白话小说叙事美学中有一贯的地位。

酒色财气被几百年来的文学叙述与评点描述批评着,更得到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肯定。思想界为叙事文学的虚构造成了自由的精神空间,同时也备受儒家主流思想的指责:“今渠谓酒

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有此便宜事,谁不从之。”^①酒色财气作为一种描述性价值标准,自然不如儒家主流思想的规范性价值标准清晰。人们通常认为后者“是通过考察人类的特点和指出可以把人类引向完美的那些价值标准所发现的精神性的东西”^②,而对描述性的价值标准的精神内蕴相当程度地轻忽了。酒色财气太日常化了,喜欢标示精神高蹈的知识界以为一谈就俗。但是日常生活是无可回避的,叙述日常生活为主的扬州评话当然回避不了描述酒色财气的要素,并在不充分自觉的状况下将其在日常生活中作了秩序化的安排。说书人的叙述主体即令未曾打上李贽(卓吾)的印记,可是评点《水浒传》的金圣叹仍是他们精益求精打造书词的重要资源。王少堂受其影响,自觉地描述了酒色财气在其主人公日常生活行为中的内核作用,并以之建构其活动的饮食空间^③。

如此说来,扬州评话的饮食空间即是市井日常生活的伦理与精神空间。“王派水浒”主人公的饮食空间不断转移,形成其生活秩序的相对开放,在酒色财气的维度上有多样表现。王少堂叙述的主人公武松、宋江、石秀等,总是生活在一个迁移的过程中。这个空间的移动不仅仅是主人公换一个地方、与另外的人同进饮食,而是他们在酒色财气的秩序空间中比常人拥有更大的活动可能。《水浒传》中所谓的“替天行道”的英雄们不过是一群四方奔走的“流氓”。从人物的流动漂泊讲,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水浒传》那样流动的身份特征者较少。这是因为以“家”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不让人们拥有过多的空间移动的自由。武松等人是生活在主流文化之外的“化外之民”,一部《水浒传》其实都在说让英雄豪杰畅快饮食,获得和拥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空间,“王派水浒”可谓得其真精神。

或问武松等的流动生活为何如此执著于饮食?答案是在于演述的便利。“王派水浒”的饮食演述重在人物的互动而不在享用饮食,在饮食活动联系着的一定时间地点上的人际交往,所以这个空间是人的活动的空间,饮食只是一个人物空间的组织媒介。江湖豪杰们的聚集,都是任侠使气的场合,无论是融洽还是冲突(不打不相识)都要有个契机,这就是饮食,归因仍是说书人和听书人想象力的世俗平庸。宋代以后的评(平)话的内容都是世俗的,不同于《世说新语》的“玄远冷俊”、“高简瑰奇”与“缪惑”,也不是《山海经》的出于人力之上,“奇才异能神勇”^④。扬州评话如“王派水浒”说的都是身边的人世,书中的人的生活,除了原著的一些框架脉络,大都脱胎于说书人的经验。书中人物/说书人的前现代生活,缺乏广阔社交、缺少深广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即使可以侠义地游走江湖,过的仍然是一种日常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是由评话叙述主体赋予的,从日常饮食出发,扬州评话中培养出一种将任何事情都日常化的态度。施恩探监、因使钱而格外通融,可以在狱神堂摆酒与监中人犯(武松)饮酒叙话,如果放在和晚清扬州评话高峰同时的谴责小说中,一定成为抨击黑暗政治现实的对象,然而“王派水浒”中因为日常的同盟兄弟关系而被肯定、赞叹。他们的饮食空间是从家庭兄弟夫妇的人伦空间变化成广义的四海兄弟的空间,武松不仅可以和武大郎、潘金莲兄嫂喝酒,更可以和盟兄弟宋江、施恩等人喝酒,他不仅可以在山东阳谷县,还可以在河南孟州、河北喝酒。前现代社会中的扬州书场上的听众,很为钦羨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饮食空间中的自由。英雄豪杰的江湖生活,听众与说书人都未曾体验过,他们想象这些江湖英雄生活的便捷途径,就是将其日常化。在衣食住行的想象中,集中于一个“食”字,无论住还是行,反正都得“吃”,所以饮食空间的开拓就是说书人致力最勤的所在。王少堂以不变应万变,依靠酒食财气来解释描述各种生活,把各种生活的可能性牢牢地拴在饮食上,弥补其经验上的局限。

若是继续追问“王派水浒”饮食空间拓展的动因,就必须进入到叙述者依据酒色财气描述与建构功能的讨论。王少堂说的四部大书,男性的主人公的流动漂泊都肇因于“色”。说明白,

就是因为其家庭中出了一个淫妇,逼得他们离开家庭饮食的小环境,进入一个更大的空间。“王派水浒”的四大部书,历来讲《水浒传》中的四大淫妇:潘金莲(《武松》)、阎惜姣(《宋江》)、潘巧云(《石秀》)、贾玉姣(《卢俊义》),其或为妻、为妾、为嫂,她们的美色惹出来种种风流祸害,逼得四部书中的主人公武松、宋江、石秀和卢俊义家居不稳,或流配或逃匿于他乡江湖。于是,好酒的武松才会一路行来,把山村酒楼辟为饮食空间。被人们阐释为“官逼民反”的《水浒传》的英雄世界,原来是淫妇逼男人走上不归路,这些女人都作了这些男人的刀下鬼。没有潘金莲,就没有武松的十字坡与卖蒙汗药酒的孙二娘“不打不成相识”,就没有安平寨把酒与施恩结拜盟兄弟,就没有“血溅鸳鸯楼”的酒宴与墙壁血书“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武松的酒/色生活秩序的失衡,造就了一个更广大的饮食空间、一个江湖世界。王少堂的江湖世界只能依靠饮食建构起来。

“王派水浒”描述的这个世界,多靠饮食为媒来维系,酒色财气四端,色、财、气皆可依赖于“酒”,而无酒不成饮食,几乎是表现中国人生活的文学共识。于是“王派水浒”中的情色想象离不开酒食,酒席桌上显示人的钱财身份地位,喝酒时候才充分显示人的个性。饮食是人生的枢纽,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表现前现代扬州人日常生活的真理。尤其在产生和演说扬州评话的地区,就说健在的九十岁左右的家庭妇女,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整天只是为全家的一日三餐而努力,一顿午饭可以让人从早忙到中午饭菜上桌。也就是说,曾经有一种人类的文化生活方式,全部目标就是为了有节律的饮食。要问这种生活有否价值,那是根据不同的人的生活态度决定的,但正是这样的生活基础,才决定了“王派水浒”为代表的扬州评话的饮食想象,才提供了酒色财气的描述性价值标准的秩序空间。

以情色想象而言,单讲潘金莲,她的主动调情和乐于接受的调情方式,都是在酒食场面上。旧俗男女不同席,只要男女甘心情愿地坐在一个席面上,进一步的情感乃至身体的男女爱都是有可能的。“金莲戏叔”一段,武松要解款去东京,安排酒食送回家中,等兄长回来饮酒叙别。金莲发现这是一个慰解难遂心愿的机会:

奴家几番眉目传情将他盼,他故意儿拿老实推。幸喜今日送回肴和酒,奴家陪他对饮吃三杯,叔嫂通奸怕着谁?”

她便借酒挑逗武松,意欲“到武松旁边,直接朝他大腿上一坐,不容他分说,右手就把他一搂,左手就把这杯酒朝他嘴里倒”。不料武松摆出一副凛然正气,直接教训金莲恪守妇道,几乎动手打了她。潘金莲被压抑的情欲恰好逢着了西门庆。王婆勾奸,和西门庆共谋设计裁衣,又让西门庆作东为金莲暖手(吃酒),于是先是王婆、西门庆和潘金莲三人同席,嗣后王婆忙菜买酒,西门庆和潘金莲二人居于一室,饮酒进食,饮食之间就作成了西门庆的好事。从武府的厨房到王婆的内室,一概是饮食场合,在不同的空间里,潘金莲从单恋到失落,无意中被王婆谋算走上了与西门庆遂欲的途程。潘金莲先后逢上武松与西门庆,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无论情欲之成与不成,饮食为媒的演述方式却是不易,先后合掌的文章,有一个现成的题目:饮食男女!

武松好酒、不沾财色而任性使气。他因酒食而连带地碰上各种女色:拒斥潘金莲,痛贬孙二娘,佯戏谢三姐,放弃韩玉兰,搭救武金定。武松一路走来,饮食空间的变化,女色的更替,都为完成武松不念财色的本真形象。这一系列女人同时也转折地与另一维度“气”发生关联。武松“好动不平之气”,只是为伸张正义,这一系列女人(色)又做了“酒”与“气”的中介。潘金莲引

发武松“杀嫂祭兄”、“斗杀西门庆”这两回书说“替兄报仇”的过程,释放武松一腔抑郁之气,成就了他非同寻常的精神个性。杀潘金莲与西门庆过程一致,叙述者仍然利用酒食场合。为杀潘金莲,武松摆酒请本坊邻居做人命见证。从施耐庵到王少堂都全力铺叙“杀嫂”的场面,其实杀一个妇人无需如此费力,看来擅长文字虚构的人们,无论是动笔的还是动口的,都喜欢利用饮食做文章。若非饮食,《武松》全书最富喜剧趣味的两个人物,喜“吃白大(搭)”的肖城隍与李土地就无从登场。更有意思的是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的饮食空间:“上回已畅写淫妇好色,虔婆爱钞矣,此忽乘便借邻居铺面上,凭空点染出来”^②,武松请来的开各色店铺的左邻右舍,开银铺的是“财”,开纸马铺的是“色”,开冷酒铺的自然“是酒”,开饽饽铺的是一股“气”。总之,不外酒色财气而已,武松摆酒的饮食场合为中心,周遭的左邻右舍就是“酒色财气”。即使叙述者不是故意安排,金圣叹的阐释也是有价值的一家言。杀完潘金莲,接着就叙述斗杀西门庆。为连接两个饮食场面更紧凑一些,王少堂更改了武松去西门庆药店打听其去向的叙述,安排何九先打听得确切消息报信给武松。于是,武松从杀嫂的酒食场合奔向另一个场合,西门庆在狮子桥边的望月楼上吃酒,武松从楼上开始斗杀西门庆。叙述因此变得更为“一”气呵成。分析饮食空间与酒色财气四端的关系,就像踢球一样,从任何一点触发都可以使得叙/论述运转自如。当武松杀完了奸夫淫妇,将两颗人头发丝纽扣挑在肩上成“一担头”时,以饮食为媒介的替兄报仇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回顾潘金莲与西门庆从情缘初结到“一担头”被杀,其间大小小几许酒食行为时/空贯穿,才成就了完整的叙事。

英雄本色不爱财,这一品行也被王少堂结合到饮食空间中叙述。武松在在景阳镇与酒店小二冲突,却是为多付给店家的钱。因为武松舍财,在飞云浦外的荒镇上,他被酒店的小二误认为是流串作案得手的小偷。相反爱财的人也被王少堂在饮食空间中表现。孟州城衙门中的长解王洪,受蒋门神之贿要谋害武松。他在玉佩楼吃饱喝足,现出一张“红彤彤的脸,油光光的嘴”,受财与进食同步进行。武松赌气吃掉五十四个大包子,耗损了王洪三百六十五文,则让他伤心。吃人家的与被人家吃,一进一出,足以让贪财的小人思虑半晌。“财”激化了王洪与武松之间的矛盾对立,使之成为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也让下文武松杀人无需任何犹豫。一般人毕竟是爱财的,有钱的人总是利用钱财赢得高人一等的地位。武松在蜈蚣镇上酒店进食,隔席一老二少吃酒,少年人坐首席,老者坐在横头,只是因为年轻者有钱。老者每天给他们说点故事、新闻,揩点油。一旦没有什么有趣的笑话侍奉少年人,就被骂“脸真厚”。王少堂也看惯了逐渐商品化的社会,看着人们恃“财”傲物,有钱为大,而不遵守长幼尊卑的礼数。世界上尽多葛朗台那样不舍财的人物,西方小说习惯突出其恋“财”的心理变态的“癖好”,“王派水浒”处理财则将人物放到饮食空间中试验。

如何把握饮食空间与描述性价值标准之间的关系,《水浒传》乃至“王派水浒”的叙述人对这一标准究竟持什么态度?“描述”不是“规范”,这样的价值标准常常是不确定的,乃至在前后叙述中取不同立场,显得自相矛盾。即如武松人格行为的主要特征,好酒、好动不平之气。若以打虎看,一分酒一分气力,酒壮英雄胆,没有这“三碗不过冈”,就没有武松胆气过人,精拳捕虎。没有正义感,没有抱不平的胸襟,武松就不会夜走蜈蚣岭,搭救面不相识的武金定小姐,与武艺高过自己的吴千动手搏命。《武松》第九回“吊打白虎山”,武松也是因不平之气,抢了孔亮的大菜吃。喝醉酒跌落涧中的武松被吊起来打,失尽威风。酒食空间转移了,从喝醉酒景阳冈上打虎,到喝醉酒被人吊打,一样的饮酒,却是两样的结果。饮食空间的转移,其实是要传达一种道德的训诫。这就是宋江与武松二人酒席上所云:“你全是酒上误事,血气不平,好管闲事。”宋江否定了武松好酒的饮食习惯,也否定了他仗义行为的基本价值。

饮食活动是中性的,饮食想象却可以有不同的维度,饮食空间是开放的,相关的酒色财气要素的描述并不因这个空间而获得确定不移的价值。书中人物的判断并不代表叙述人,但是从《水浒传》到“王派水浒”,文本内部都含有自我颠覆的内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②。他拉开与《水浒传》文本的距离、透视分析宋江的人格,做出这样的批评判断,但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并不单纯提供这样的读解。同样,“王派水浒”的叙述主体仍然是一种客观描述,宋江的一番极富主观色彩的训诫,并不能否定演述者交代的武松的过去,但是可以是对武松的生活道路的一种回顾与反思。这里透露出宋江有一副乡愿嘴脸,王少堂的立场并不等同于宋江式的乡愿。宋江一边混迹于江湖豪侠中,一边时时刻刻等待招安,心中存在些虚伪的理学教条,脚踩江湖与道学家两只船。他对武松的否定,并不是一般朋友之间的规劝,实际上是一种身份态度对另类思想的围剿。《武松》一书,饮食空间叙述的最大冲突在于此。说书人在饮食空间里的酒色财气秩序的建构,免不了自我颠覆、似是而非。留给我们的工作,不是要解构它,而是要让混沌的秩序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关系更清晰一点。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指为诗词戏曲小说形式之嬗变。我们还可以说一地域有一地域之饮食文化/文学之呈现。时空而外,我们更不排斥文化内容(如饮食)进入文学的超越性。从《水浒传》到“王派水浒”,我们处处可见市井饮食文化的一以贯之。其实,追溯中国文学的散文叙述,参见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可以看到明代小说中的饮食叙述与《史记》的承接,金圣叹批评施耐庵极力铺叙施恩酒食招待武松:“常言太史公酒账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③归结到我们讨论的“王派水浒”口头文学的演述,简直是太史公文字下放民间。

反观司马迁,从“断烂朝报”的《春秋》到“酒账肉簿”的《史记》,复归生活,与饮食人生发生关系,这就是中国史书文学价值极大的一部分。以《史》、《汉》为圭臬的中国文章/文学,一旦与生活发生实际的联系,就回到酒肉上来了。从“王派水浒”返身进入前现代的饮食文学想象,不由地惊讶于饮食在生活时空中占据了那么重要的地位,饮食时间曾经可以替代计时,它不是抽象的,它有生命,因为记录了某一时段的人对生活的把握方式,这个方式对自命先进的后现代社会来说,兴许是对苍白的生命的补益。当代生活仍很复杂,人们试图把生活说明白,其实正像饮食空间建构的相对混沌,许多不大能说明白的日常生活更让人感兴趣。今天我们往返于“扬州评话”鼎盛的时代与当下,从饮食一途去感受,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体悟人类是如何从前现代走过来的。

① “王派水浒”是扬州评话说《水浒》的重要风格流派,代表人物王少堂是“王派水浒”几代艺术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下文用王少堂的名字,差不多是作为一个涵盖所有有成就的扬州评话艺术家的集合概念使用。“王派水浒”现存书目有《水浒》四个“十回书”《武松》简称“武十回”,还有《宋江》、《石秀》、《卢俊义》几个十回。扬州评话因其卓越的口头文学艺术水准与深厚历史渊源备受世界关注,《武松》话本代表着扬州评话的最高文学水平,王少堂的表演在大师林立的书坛上登峰造极。

② 扬州评话是书台上表演的艺术活动,书面记录的书词可称为叙述,与声音和动作语言的表演综合考论,则应该成为“演述”。这里基本按照书面文本来讨论,所以一概用叙述。

③ 扬州评话演述的原书目有讲史、朴刀杆棒、神魔、市井,但是在扬州评话的书台处理过程中,并不把英雄、神魔放在最为突出的地位上,集中致力的却是台下听众最为熟悉的市井日常生活。

④ 据罗常培回忆,小时候读书即与老舍一起去听评书,一路模仿黄三太。老舍谈起北京书坛上的艺术家双厚坪的说书艺术来,也颇有心得。

⑤ 老舍《谈〈武松〉》《老舍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卷第551页。

⑥ 《水浒传》金圣叹批本,第二十七回《武松威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大段列举饮食:“连叙管营逐日管待

- ……无不细细开列,色色描画。常言太史公酒账肉簿,为绝世奇文,断惟此篇足以当之。”
- ⑦ 老舍《谈〈武松〉》:“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老舍文集》,第16卷第549页。)
 - ⑧ 《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的主要场景都是在“长三书寓”中,主要的饮食活动是妓家生意的重大来源,狎客在相好本家“摆台”面请客,客人在当场“叫局”侑酒,一年三节结账。
 - ⑨ 《水浒》中22回《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到31回《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松江》,首尾两回各有一半文字叙述武松,实际上只有九回篇幅。考虑其参考吸收的各种评点文字,参见北京大学出版社《水浒传会评本》,总字数不足12万字。王少堂演出录音文字达100万字,《武松》整理本字数不一,20世纪50年代未整理成功,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有80多万字,90年代为纪念王少堂诞生一百周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有90万字,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丽堂演出整理本为79万字。
 - ⑩ 张岱、吴伟业和黄宗羲记叙柳敬亭说书,也都强调其细腻处,但是与王少堂有别。张岱说柳敬亭,“描写刻画,微入毫发”,但是入景阳镇酒店喝酒的武松,表现其人格个性的重点在于声音气度而不重饮食。柳的“闲中着色”是说武松一声吼,店中空酒缸皆“瓮瓮有声”,却不在好酒的量上着力。
 - ⑪ 清末民初征小说家贡少芹的《傻儿游沪记》,用洋场观光的想象方式替代了扬州评话式的饮食文化想象,从扬州去上海的傻乎乎的少年正说明前现代文化的价值失落。
 - ⑫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中对“翻然思改革……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的有识者,判明耽溺于传统评书的一般社会的人们为“细民暗昧”,晚清扬州市民于大体国是诚然暗昧,但是饮食文化的小传统的继承却更多地依赖这些细民。
 - ⑬ 扬州评话的鼎盛从清代中叶开始,到清末民初极盛,当影像兴起时开始衰落,网络时代的受众已经限于有传统审美经验的老人。参见《扬州曲艺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 ⑭ 中国其他有较深历史传统的城市无不如此,李劫人“大河三部曲”中的旗人、汉人都有早茶习惯,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实际上就是四川“吃讲茶”的一个过程。
 - ⑮ 王少堂在王家活动范围最广。其书台艺术(表演与话本)成熟前,活动的最大范围西至安徽芜湖,南至上海,往东往北都没有出过江苏省境,其后继者对话本内容涉及的文化空间并没有怎样丰富(参见李真、徐德明著《王少堂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 ⑯ 参见海德伦·梅克勒《宴饮的历史》,胡忠利译,希望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人上古谈饮食,如枚乘《七发》问答中讲到“醒浓肥厚”等,主要关涉养身。
 - ⑰ 邹颖泉语录,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渠”即指李贽,说他对社会精神秩序的动摇与破坏。酒、色、财、气元素是世俗生活哲学中较柴米油盐形而上的层面。在一般人的生活中,它们也受儒家中庸思想的调节。其中,“色”与“气”的思想单元(unit-ideas)又和释、道哲学密切相关,“色”既指女色也指物质领域的表相,“气”有关人的精神个性与事物起源,可参见小野泽精一等著《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⑱ 拉兹洛《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 ⑲ 王少堂自觉接受金圣叹的美学思想,在书词中屡屡见出,好些内容是从批语中衍生出来,如《宋江》中的《混城》,直接引用则有《血溅鸳鸯楼》中对“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的评点等等。
 - ⑳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篇、第七篇。
 - ㉑㉒㉓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1页,第15页,第525页。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文学院 扬州市文化局)

责任编辑 山木